

财政学与中国财政^{*}

——理论与现实

自 序

（引言与自序合并）

（这篇自序为本书各章之锁钥，当作本书第一章）

我在授课的时候，常对听讲的学生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一极大不同的一点，即我国大学中之理工学院，因我国科学落后，不妨选用西文课本为教本，参考书当然应用西文书本，至于社会科学，如经济一门，参考书不妨中西书籍互用，教本则必须用国文原本（并不指译本而言）。盖外国教本皆根据外国的实际情形、社会环境以及历史背景写成的，以之用于中国的大学，非特不易使学生领悟，且要发生极大的流弊。例如余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曾选读过银行学与货币学，讲授者皆是著名的教师。美国的一般银行业务部大概都有收款课（*receiving teller*）与付款课

^{*} 本书原由商务印书馆 1948 年 8 月出版，列入《大学丛书》。署名中央研究院院士马寅初，并在扉页之后标明“此书献给母亲”。

(paying teller 两部分 存款时 收款与记账全由收款课办理 是一个手续。支款时将支票或存折交予付款课，付款与记账亦全由付款课办理，亦是一个手续。在中国则无论存款或支款，收款与付款之手续，划归出纳课办理。是美国之一个手续在中国则化为两个，在银行用人较多，在顾客要等候多时。若问以何以有分成两个手续之必要，则归因于“制与衡”的作用 (checks and balances)，使两部工作，即两个手续，相互牵制以防舞弊，用意良善 未可非议 盖国情如此 不得不然也。但一肚子充满着西洋学识的我，回国之后，见了这种种情形，心理上起了一种极大的反感。于是 余不能不就中国的实际情形 重加一番考察与研究 可以说痛下工夫，把中国的实情与西洋的学理配合起来，遂想出比较适合于中国的学识，用短篇的演说稿出之以飨读者。尔时人们一般对于经济问题尚不甚注意，故书本不甚适合一般胃口，只能以短篇文字出之 大多数已包含于四本《演讲集》之中)余现年六十有七，费了四五十年的工夫，而所得者不过如此，不禁有人寿几何之感。

余以为经济理论可以分为纯粹理论 (pure theory) 与经验理论 (empirical theory) 两种。我们从泰西搬来的理论 既不以中国的现实为对象，可以视同纯粹理论，是一种训练思想的宝贵工具。它不仅训练了我们的思想，且教会了我们研究的方法，可以说纯粹理论包括了经济哲学与经济学方法论两部分；读了这两部分，我们所得的益处确实不少。至于经验理论，就是经验的经济理论 是中国的经济学者 就一定范围 以一定的立场 把内容复杂、包罗万象的国内经济事实搜集起来提炼净化之结果。在提炼之时，就要用从西洋学来的方法，那么影响我们的经验理论的主要因素，不外乎客观的经济事实与主观的研究方法。

余对于治经济学的感想既如此，故着手著此书之前，即有把

关于财政之纯粹理论与现实合冶一炉，得出一种经验理论，使读者容易明了，不致发生理论与事实脱节之感。社会是一个大实习室，而学校是一个小训练所，在训练所中所学的，必须与实习室中所做的趋于一致，庶不违反“学以致用”之原则。余总以为中国研究经济学的青年，应多注意中国的实际情形、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我们生在这个社会之中，决不能离开这个真实社会，而高谈空论。但我们同时亦生在这个时代，与这个时代的潮流亦不能脱节，故事实与理论有合冶一炉之必要。今日的新古典学派，已大受凯恩斯学派（Keynesism School）的攻讦，几乎驳得体无完肤。凯恩斯的大著《就业、利息与货币之一般理论》在欧美国纸贵洛阳，而在中国亦大受我国学者的欢迎，论坛上一提到凯恩斯的言论，几于无人不奉为金科玉律。以时代而论，“一般理论”代表时代的新思潮，吾人不能不读；但以空间而论，它是根据英美的情形而写的，与中国的情形可谓风马牛不相及。故此书适用于研究高等经济学者，而对于初学者，不但不适用，亦不能用，更不宜用。兹将“一般理论”的轮廓述之于后，以覘其是否于中国有用。

一、“一般理论”之轮廓与凯恩斯学派之主张

（一）不自愿失业之存在。

凯恩斯氏之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之一般理论》出版于一九三六年。因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问题解决至感棘手，故凯氏从事于就业、利息与货币等问题之研究，其关系为全部的，非限于任何一部分失业问题之解决，故自称其书为一般的理论。希望资本主义国家均能得其理论之助，以达充分就业之目的，使不自愿之失业（involuntary unemployment）没有存在。盖失业问题之所以严重，因不自愿失业者太多故也。自愿失业问题，无关宏旨，不加以讨论。譬如本书著者本人，不愿在大学任教，系本人自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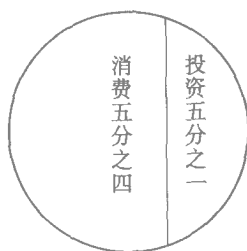
决意必已熟筹慎虑方愿辞去教职自无问题发生。若因被迫失业生活不能预筹保障问题就大。凯恩斯因批评正统派不免得罪其老师马歇尔氏(Prof. Marshall)。此时马歇尔氏虽已逝去，而其卫道之门人如知名之披古教授(Prof. Pigou)即以其违夫子之言，起而反诘。马歇尔氏对于古典派之学说有所修正，故后人称他的学派为新古典学派(Neo-classical School)然有若干点，仍继承古典学派之余绪。古典学派以充分就业为前提。据舍依氏(Say)的说法供求自趋于平衡(equilibrium)。譬如甲产米，乙产布；甲的供就是米，乙的供就是布；甲以米供乙，乙以布供甲，无异甲以米求换乙的布，乙以布求换甲的米。故两方之供求必趋于平衡，决无失业之理。因而古典学派的学说，即假定充分就业以为前提。不料凯恩斯的异军突起，对于古典学派这个假定，猛予攻讦。他以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以不充分就业为常态充分就业是例外供求双方势力非必常能相等因不自愿之失业者，几于无时不存在也。

(二) 生产投资与储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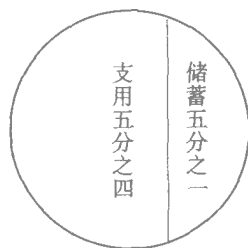
人民之所得先是实物所得来自生产能生产才有所得。所谓生产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指劳动、资本、土地与企业四种要素合作而言。生产之结果为实物。若以此生产之实物，直接分配于参加生产之四种人，即成此四种人之实物收入。此项实物，一部分供消费，一部分供投资。如农夫生产谷子除供本年度食用外，酌留一部分作明年之种子以供明年再生产之资本(投资)惟实际上之分配，常借货币为媒介，参加生产者之所得为货币所得；所得之用途不外两端：(甲)支用，(乙)储蓄。支用是为消费，储蓄是为投资。如第一图所示。

第二图之货币所得，就等于第一图之实物所得。假定参加生产者支用货币所得五分之四以购买实物，则他们的货币所得减

少了五分之四，社会的实物亦必比例地消费了五分之四。不过就货币言，称之为支出（expenditure）就实物言称之为消费（consumption）两者在表面上是两桩事，实则一也。其余的五分之一的货币所得，作为储蓄，则投资者所投之资，亦必使之等于这个所储之数——五分之一，故实物上的五分之一要使之等于货币上的五分之一。如投资少于五分之一，则剩余下来的实物，等于废物，陷于生产过剩，货弃于地的状态，物价必跌，生产之企业家不免亏本，工厂倒闭或歇业或减少产量，则工人之不自愿失业者更多。故问题的关键，在使投资等于储蓄。但在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达的国家，欲使投资等于储蓄，是一桩不容易的事，何以故，请看下节。



一、实物所得



二、货币所得

（三）边际消费倾向与资本的边际效能。

参加生产者之所得愈多，其消费率将愈小。如月得千元者，支用八百元，储蓄二百元（省二成）；月得万元者，不会用八千元，省二千元，或仅用七千元，省三千元（省三成）；月得十万元者，或用六万元，省四万元（省四成），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所得愈多，支用（即消费）之数额虽仍增多，而支用额（即消费

额)对所得额之比例则有减少的倾向。换言之,支用额之绝对数虽增加,而相对数则减少。此种趋势,称为边际消费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故所得多者,消费倾向减少,即支用数额减少,而储蓄数额按比例增多。结果社会愈富,消费有相对地减少之趋势,储蓄有相对地增加之趋势,愈使投资不易等于储蓄,因为投资不能无限制地增加。投资之结果,必延至数年或十数年之后。例如兴筑铁路,非期以五年或十年之岁月不为功。届时幸而成功固好,不幸而失败,则过去所投资本尽成废物。此种投资成效之大小,称为资本的边际效能(marginal efficiency of capital)。企业家之肯筑路与否,要看路成功之后有无获利之希望。换言之,要看他所投资本的边际效能之大小。他可发行债券,筹集资本,其利率如低于预期之资本的边际效能,尚合算,否则不合算。美国的凯恩斯学派,甚至说美国的经济已达饱和点,投资的门路已绝,足见资本之边际效能很低。凡比较有利之事业,皆已投资尽净,故欲推进投资,必须另有办法。

(四) 利率政策。

资本之边际效能既低,势必降低利率,方可促进投资,且必须使利率降至边际效能之下,方有利可图。中国资源丰富,投资之机会甚多,资本之边际效能必甚高,但利率亦甚高,故一社会之投资为资本之边际效能与市场利率所限制。如边际效能与市场利率相等,投资即不能推进。此为投资之关口,凯恩斯称之为瓶口(bottle neck),犹水已装满至瓶口,无法再加矣。故欲推进投资,只有两个办法,非将技术水准提高(边际效能提高)即将利率降低,俾储蓄者与投资者易于接近。

(五) 储蓄者与投资者是两个不同之人。

从上面看来,问题之焦点是如何使储蓄等于投资,因储蓄者与投资者在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是两个不同的人。储蓄者未必能

投资（例如经营企业）投资者未必自有储蓄，即有或亦不足够，于是设法募集巨资，向储蓄者借款，但两人之目的并不一致，储蓄者的目标在利息，投资者的目标在利润，其利害是不一致的。

（六）公共工程与赤字预算。

倘吾人能把技术水准提高，资本之边际效能仍可提高，如机器之生产力加大，以同一时间同一劳动而能产更多之实物，与更多之收入。市场之利率如不跟着提高，投资之机会自可增加。倘技术水准不能提高，私人投资无利可获，惟有政府负起责任，举办公共工程，以维持工人之就业，并能消费过剩之实物。在这种不景气的时期，人人视投资为畏途，人力物力皆无出路，不得不由政府出面来救济市面的不景气，以政府的支出来弥补私人支出之不足，以免除消费不足或生产过剩的现象，兼以救济失业。因此原以收支平衡为原则的财政，至此不能不以赤字预算为准绳。于是在财政学上就出现了所谓的“财政新哲学”。虽然凯恩斯没有讨论赤字财政，但循他的思路而推展，非至赤字财政不可。

今日英美正在讨论什么叫做公共工程政策，目的在以公共工程为消除商业循环的不二法门。当工商业活跃时期，公共工程必须延缓，以待工商业渐趋萎缩时再行举办。政府的行为，须反乎私人企业之所为，因后者的动机是在获利，而前者则在求安定。

（七）如何达到充分就业（在生产要素流动性甚大之假定下）。

充分就业的意义，可以从不充分就业方面反证出来。原来失业可分作不自愿失业、自愿失业与临时失业三种。如社会在现在物价与技术水准之下，以资本一百万元从事生产，假定其边际生产力与利率相等，若中央银行采低利政策，膨胀通货，提高物价。

又假定工资不变，则工人之实际收入减少。如物价指数自一百上升至一百三十，企业家以为有利可图，或扩充规模，或新设企业，多雇工人，此多雇之工人即为从前之不自愿失业者。现在之实际收入低于从前，此多雇之工人尚愿就业，则从前实际收入多时，彼等岂有不愿就业之理，而事实上竟告失业者，迫不得已也，其为非自愿失业可知。故当物价提高，货币工资不变之情形下，就业工人逐渐加多。此加多之就业工人，即为前此之不自愿失业者。物价指数如继续增高至一百四十，企业亦继续扩充，就业人数随之扩充。就业工人愈多，即不自愿失业之人愈少，直至最后，物价虽再提高，就业人数已无法再加。企业家欲扩大规模，添雇工人，非增加货币工资不可，而以增加工资的方法所添雇之工人，大抵皆从挖取他处之工人而得，则劳动这个要素的流动性一定很大（mobility of labor）。久而久之，一国之内，已无不自愿失业之人，即已达到充分就业之境地。故工资开始提高时，即为充分就业之明证。故（甲）技术不进步；（乙）物价高；（丙）工资亦高；（丁）通货膨胀四者为充分就业时最易并发之现象。以上即为不自愿失业变为充分就业之一说。

自愿失业性质不同，如集体议决罢工、怠工，或其他感情作用，不愿为资本家雇用，而解除雇佣契约，因而失业者，均为自愿之失业。此种自愿失业，无论何时，皆所不免。再如从甲地迁至乙地，觅取工作或从甲业转到乙业，不免暂时失业，中间不免闲散。又如因疾病、灾害等之意外事变而发生之失业，均为临时失业。临时失业与自愿失业均无关宏旨，关系最大者，厥为不自愿失业。

（八）在极端资本主义的国家分配不均、贫富悬殊为恐慌之最大的原因。

美国所最怕的，是有周期性的经济恐慌。自独占事业逐渐兴

起，自由经济的领域愈益缩小，生产操在大企业家之手，对于劳动阶级采取榨取和高压的手段。劳资之间分配不均，富人用不了，贫人买不起，因此有生产过剩，货弃于地之患。我们在上面已说过，所得愈大的人，其用于消费的比例愈小，这是必然的。因此富人的所得，苦无出路，有钱无法用掉，所以剩余的物资更无去路。至于穷人，他所居的地位适相反；富人用不了，贫人买不起，此皆由于分配不均所致。剩余物资，既无法推销，于是物价跌落，营业亏折，工厂关门，更多工人失业。工人失业之后，他们的购买力愈小，于是物价愈跌，没有关门的工厂也关起门来了。失业者更多，购买力更小，影响了其余不关门的工厂，圈子越弄越大，最后波及银行，因银行放出去的款子收不回来，亦不免于倒闭。美国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大恐慌，竟波及中国和日本，因为美国既陷于恐慌，对于中日的出口货，当然不感兴趣，所以不来买了。

二、凯恩斯的“一般理论”与凯恩斯学派的主张于中国是否适用

以上所述的，是完全根据于极端资本主义高度工业化的英美两国的情形而写成的，以之介绍于中国人民，不啻纸上谈兵，不切实际。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而农业经营几全数为小农经营。无论如何，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生存，是寄托在这个小农经营之上的。人民的生活，是植根在农村，不论对外抗战，对内党争，兵员的补充，粮秣的征集，均须仰给于农村。甚至于军器的制造与购置，亦须以农村出产的物资，到外国去交换军火的成器与原料。当然我们的社会是要向前飞跃的，决不会停留在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之中。可是，我们社会的飞跃，不论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都要以现阶段的农村社会为基础。

在现阶段的农业社会里面，人民与土地发生极密切之关系，使其乐定居而恶迁徙，尚勤朴而恶游惰，性情稳重而不浮嚣，体格强健 繁衍力强。这几种美德 皆系从农业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但从另一方面视之，农业社会亦有种种不利于发展之特性。其最著者 有下列种种：(1)农民重传统而轻改革，无以促进社会之进步。(2)安贫守朴，少奋斗的精神。(3)知识水准低，乏创造的能力。有此各种缺点，社会遂无发展之活力，故从来统治者莫不重农而抑工商，即所以利用此两种相反之性格，竟使农业社会之种种弱点，成为我国经济组织上的严重问题。即在国民心理上，亦形成过于重视农业之普遍观念。对今后工业之发展，可发生消极的阻碍作用。但我们欲改农业社会为工业社会，亦当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不能以西洋最高、最新的学说来应用于中国。

兹就以上所述各点，分别予以批评如下。

(一) 中国农村中无所谓自愿失业与不自愿失业之分。

中国的小农经营与英美的工商业经营，性质大不相同。在中国的小农农场，经营主偕其家人躬亲耕作，以雇工从事耕作者为数不多。据卜凯所作中国土地利用调查，我国耕地约有百分之九十三属于私人领有，其余百分之七属于政府、教育团体、慈善团体、寺庙、宗族等单位。农地并非完全属于农民，有一部分属于非业农之人民，而全体农民中领有土地者，亦仅限于一部分。据估计，我国农户中自有土地之自耕农，约占百分之四十六，全无土地而佃地耕种之佃农，占百分之三十；自有兼租入土地之半自耕农占百分之二十四。可是无论自耕农、佃农与半自耕农，资力薄弱，田场窄狭，多赖家庭劳工耕作，雇工无多。雇农亦为无地农民，我国雇农户数约占乡村住户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五七。由此可知我国农场中的劳力主要由家庭成员自行供给，经营主与劳动

者结为一体，无所谓自愿失业与不自愿失业。

（二）储蓄者与投资者在中国农村中同是一个入。

在英美资本主义国家里，因储蓄者与投资者是两个不同之人，他们的目标不一致，前者的目的在利息，后者的目标在求利润，故两人的利害亦不一致。故欲使投资等于储蓄，确是一个难解决的问题。如投资少于储蓄，则剩下来的实物，等于废物，陷于生产过剩，货弃于地的状态，企业家不免亏折，劳工不免有不自愿的失业。但在我国的农村中，储蓄者就是投资者；农民所生产的，以谷类为主，一部分供家庭的消费，或另有一部分供出售，还有一小部分作明年之种子，以供明年再生产之资本（投资），即以肥料，亦是资本之一种，而论，如人便、牛粪、猪粪，皆是他的家庭所自储的，用不着向他人去买化学肥料。职是之故，凡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要减低利率使投资踊跃，或由政府举办公共工程等种种学说，皆成废话。

（三）边际消费倾向与资本的边际效能。

我国农耕兼采粗放与集约两种方式，普通大农经营采前一种方式，小农经营采后一种方式。我国的农耕，既是小农经营，自用集约耕种，不过我国耕种的集约为劳力的集约，非资本的集约，因农家在一定地面上投入人工虽多，但于帮助人工工作之设备每嫌太少。英国农学专家汤纳（R. H. Tauney）先生，战前曾来华研究我国小农问题，亦谓我国农业为“投资不足，投劳过多”（undercapitalized and overmanned）。我国农耕所以采此方式者，大抵由于地少人多所致，非对此有限土地作较高程度之利用，难以供养，足见中国之资本有很高的边际效能，有利之事业，到处皆是，只患资本不足，何患资本已无可投的门路。此与美国的经济发展已达到饱和点的情况，大不相同。

至于边际消费的倾向，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如英美两国，消

费额对所得额之比例，有减少之倾向，储蓄额对所得额之比例，则有增加之倾向。但中国之情形适相反。据卜凯战前调查华北及东南六省农家之结果，平均每一农户全年之生活费用仅有二百二十八元。此项费用之用途分配，食物一项约占百分之六十。又用于食物、房租、衣着、油灯燃料四项生活必需用途者共占百分之八十三，用于其他用途的只占百分之七。用于生活必需消费之部分甚多，即表示农民生活程度特低，因费用于满足必需消费者愈多，即余下可资作其他高等文化享受者愈少也。在此情形之下 如能设法增加农民之收入(所得)则用于其他高等文化享受者(如儿女学费等)必随之俱增 消费额只有增加，一时决无减少之趋势。

(四) 利率政策。

在极端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因资本之边际效能很低，势必降低利率，方可促进投资，且必须使利率降至边际效能之下，企业家方有利可图，因企业家之目的在谋利润。我国之农业经营，与农家之生活，有切身利害关系，其目的与其谓为在于谋利润，毋宁谓为在于求生存。即令农场无利润可获，甚至遭受损失时，亦恒继续经营。此在各地乡村殆为常见之事，良因人多地少而工业又不能容纳，农民除务农外殊难另觅谋生的出路，故农业经营虽无利润，究仍可取得低微收入，勉图养活，决不能如资本主义国家之企业家，一旦无利可获，即相率停业，致使不自愿失业之人数增加。

(五) 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与充分就业。

我们在上面说过资本极端发达的国家如何达到充分就业的目的。企业家以增加工资的方法添雇工人，而所添雇的，大都从别处挖来，则别处的劳动者一定可以自由迁移，方可被挖，足见劳动这个要素在英美即有流动性。但此不能求之于中国。中国

的小农以农耕为惟一谋生方法，舍此很难另觅职业，其经营农场，富有粘着性，即遭遇亏折亦恒继续从事而不离弃。至于自耕农则自有小地产，更不愿轻易迁移。且在家庭农场制之下，农场与家庭结为一体，家人同在一处工作，特富人生乐趣。家庭农场亦可令全家人工悉得工作，不必远离家乡另觅职业。可知劳动这个要素在中国富有粘着性，无甚流动性。全家人工既得工作，无所谓自愿失业与不自愿失业，既无失业，亦无所谓充分就业。

资本主义国家之大农经营，类能应经济情势之变化而伸缩其生产。遇农产价格腾涨 经营利益提高时 则扩张生产 遇价格跌落 利益降低时 则予收缩 此大农经营之利也。其弊则在雇工之有增减。我国小农既以农耕为惟一谋生途径，即遇经济情势逆转 亦难收缩生产 虽少顺应经济变迁之能力 然终不至于失业。

（六）分配不均 贫富悬殊。

我们在上面已说过，在极端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分配不均，贫富悬殊，是恐慌之最大的原因，因为生产操在大企业家之手，对于劳动阶级采取榨取和高压手段。结果，富人用不了，贫人买不起 以致发生恐慌。但在中国的广大农村中 情形又不同了。中国的分配不均，不在劳资之间，乃在地主与佃户之间。我国之农业经营为家庭农场 在租佃农场 土地、资本、劳力与组织管理四种要素之供给者，为地主出土地，为佃户出资本、劳力与组织管理，故其所得之分配实为地主与农户之两股分配。如在自耕农场 则此四种生产要素 悉由经营之农户自备 农场所得 全部归于经营者所有。此与在资本主义之大农经济结构中，农业系由资本家租地雇工经营者 大不相同。在他国 资本家是中心人物 在我国 地主是显著人物。但地主只出土地 不出资本 低利政策与他无关 增加工资 使分配稍均 更与他无涉。今日各处所行之二五减租，倒是对症良药，因为我国小农地租受习惯与契约之支

配，不如资本主义之大农经营以竞争为重要因素。因有竞争，所以地租能紧随经济情形之变化而自动地涨落。我国之小农地租，因受习惯与契约两种势力之支配，非用政治力量以改善之，无法使其低落。所谓阶级对立，是在地主与佃户之间，不在资本与劳力之间。

（七）恐慌。

我们已说过在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因贫富大相悬殊 富人用不了 贫人买不起 恐慌逐步地蔓延 最后波及于全国 以致影响全世界。在中国农业经济的现阶段 这样的恐慌 决不致发生。因经营的主要目的在求生存，不在谋利；即遇经营不利 亦恒继续生产 不能收缩 亦不肯收缩。在资本主义之工商业经营，当经济情势逆转时，必行收缩以免亏折，因此引起失业与恐慌。此其一。

我国农产供农家自己消费者占一大部分，其剩余部分之运销，普遍以产区附近为范围，一般农民皆在本地市场中出售，甚少自运远地销售者。合作运销在战前曾有少数地方试办，以棉花运销较著成效。此项工作 仍待发展 但只限于国内 输出国外者只占少数。良以生产以粮食为主，此为国内众多人口生活所仰赖，自必就地供给人口之需要，不致多运远地。农产运销之地域范围既不广泛，即遇国际贸易阻绝，或国内各区域间货物流通遮断，亦不致使近产销售遭受极严重的打击，农业经济受害不致甚大。证诸连年外战与内战之经验 似与此种论断相符合。此其二。

在物价跌落时期，容易发生不安的现象，无论何种企业，皆受打击。但我国农场生产供家庭消费之部分颇大，且农工多为家工，故受物价与工资跌落之影响大大地减少。此其三。

中国可说是天然的农业国，幅员很广大，气候、土壤在全国各地颇多不同。即在同一地方，因季节之不同，气候和雨量的差

异，所生产的农作物种类很多。为适应各种不同的气候，不同的土壤，以及不同的雨量，即食粮的种类亦有数十种，其中最著者有稻谷、小麦、大麦、荞麦、高粱、玉米、粟米、大豆、黄豆，而小麦为北部及西北部人民的主要食粮，稻米为南部及西南部人民的主要食粮。其余各种粮食作物，我们概称之为杂粮。在主要食粮生产不足的时候，或在主要食粮不能生产的地方，人民都食杂粮，其营养价值不亚于稻米和小麦。所以人民所需要的食粮，都可以不必由市场购买，而由其自力供给。吾谓地域维持着自给自足状态，即此之故。因此在战时，我们不必作全面的供应，也不必采用计口授粮的办法，以作彻底的分配管理，只要能够使都市消费区民食的来源不致缺乏，决不致发生粮食的恐慌。

中国农业经济之所以能自给自足，还有一个大原因。不但生产食粮的种类很多，即各种食粮收获的季节均不同，加以中国农民异常耐劳，在主要食粮耕种之前，或收获之后，多兼种其他杂粮。所以大多数的土地，每年都有两次以上或两种以上的收获。因此在全中国境内，差不多一年四季，无论在春季、在夏季、在秋季、在冬季，都有不同的粮食收获。即不幸某个时期有水、旱、虫害等灾害发生，其影响只及于一种或数种食粮，和一个或数个地方，不会演成全面性的歉收与恐慌。

我们知道在广州、天津、上海等大都市，每年通常有若干担洋米，或若干担洋麦输入，但查其数量，不过等于全国粮食产量的百分之一，而且大部分还是因为平日吃洋米的习惯不易改移，或因为海运较便，并不是因为国内绝对没有方法供给。粤汉路通车之后，湘米推销于广东，大大地减少广东进口的洋米数量。即此一端就足以证明中国人的食粮，不必仰给于外国。此其四。

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由于生产力的加强和生活水准的提高，一般人的购买力，大都用于购买有高度弹性的奢侈品。无弹

性或弹性甚少的必需品，在全部支出中，只占全部费用的小部分。反之，在中国无弹性或弹性甚少的必需品，则占全部费用的极大部分。高度弹性的奢侈品变动甚大，常受经济衰荣的影响，而无弹性或弹性甚少之必需品则不易受到影响。结果在英美等国，由于消费者费用的波动增加了他们经济的不安定性，在中国，因为奢侈品费用在全部支出中占了微不足道的成分，起不了什么作用，足以增加经济的安定性。此其五。

以上五点是农业国家如中国者不会遭遇恐慌之原因。

（八）公共工程。

在极端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不景气的时候，人人视投资为畏途，人力、物力皆无出路，不得不由政府出面来救济。但当工商业活跃时期，公共工程必须延缓，以待工商业渐趋萎缩时再行举办。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合逻辑的。不过在中国实行起来，困难重重。在中国百废待举，没有一桩大规模的工程，可以随举随停的。最重要的工程，莫过于运输与交通、水电与水利（尤其是治河）。试问哪一种可以在商业繁荣时保留下来，以待补充工商业衰落时之不足？

（九）赤字预算。

要举办公共工程，在财政上就要破坏收支平衡的原则，势必走上赤字预算的道路。在英美，固可以利用公共工程之自偿力以收回公债，于财政上不致发生危险。但在中国，当政治不上轨道的时候，这个方法，施行起来，含有极大的危险性。不要说政府直接参加投资，即政府对农、工、商所做之贷款，已足以造成通货的恶性膨胀。政府直接参加投资，予贪污官吏以搜括侵蚀之机会，间接向农民投资（详下）予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以囤积居奇之机会。在英美赤字预算或可产生有自偿力之生产事业，于国民有益。在中国赤字预算之运用，造成人力、物力之浪费，徒饱私囊，

未裕国帑 害多而利少(详见《审计监督》一章)此皆由于政治不上轨道之所致也。

今日我国所施行之财政政策,采取积极的干涉主义,就是“用财政力量推动金融发展 再用金融力量 扶助经济建设 再基于经济建设之推进 充裕财政 奠定财政之基础 不啻将财政、金融、经济打成一片”。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策 是用政府的力量与信用 发行公债 投资于公共工程 使国民所得增加 国家经济繁荣。可是公债的作用 在吸收社会的积储 在今日的中国 称为游资 用之于生产事业 而这种事业 皆自有清偿之能力。国民富裕 税收增加 公债自易收回 故政府以财政的力量 推动经济事业 有利而无害 或利多而害少。这样的干涉政策 是很适应时代之需要的,但不能说可以推诸四海而皆准。若以之原封不动地移之于今日的中国,则其结果,决不能如吾人之所预期。中央预算上往往编列大宗救济经费,以扶助人民与经济事业。此项救济费的支出 有直接、间接两种。直接的救济费 即发放于被救济者,不再收回。间接的救济费 是采取贷款方式 接受救济者 仍应将资金返还于政府,不过利率较低,期限较长而已。政府办理此项贷款 普通都是委托于银行代办 因银行处理贷放 比较专门 其效率自较一般机关为高,而委托办理,费用亦较节省。至银行方面,承受委托贷放,其贷放资金可与其原有资金统筹调度,以增强金融力量。此即所谓‘用财政力量 推动金融发展’者也。

所谓银行,就是国家行局,而国家行局所贷放之资金,并非自民间吸收来的积储,亦非国家行局吸取来的存款,乃是出于印刷机的转动。这样 只有加强通货膨胀的程度 使市场筹码加多,物价上涨,与政府推行干涉政策的目的适相背驰。另一方面,接受贷款者所获得的利益,由于物价的急剧上涨,正当生产预算不能确立 生产无法推进 所谓‘再用金融力量 扶助经济事业’之